

新见吴汝纶、陈三立等手批马其昶《抱润轩文》考论*

——兼谈文本从私人批阅走向公共出版

陈 锴

内容摘要:安徽省图书馆藏稿本《抱润轩文》应为马其昶《抱润轩文集》现存最早版本,较后出版本存在一定数量的未见篇目与字词之异。稿本上有吴汝纶、陈三立等名家手批,影响了文集文本的凝定。这些批校者身处马其昶的私人“批校圈”中,文集公开发行之,他们所作的批校不示外人。马其昶通过删、改、增三种策略精心选录批校,使定本与稿本的面貌大相径庭。推测马其昶处理批校的心态,一是遵循趋利避害的编辑思想,删去恶评,留下善言,维护窘境中桐城派的和谐形象;二是继承客观的批校传统,非唯名家即尽取,恪守自身的判断。校语从手批到刊刻的选录过程,也是文本由私人批阅走向公共出版的典型示范。

关键词:《抱润轩文集》 桐城派 批校本 陈三立 吴汝纶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师从吴汝纶,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清史馆总纂,是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集大成之作《抱润轩文集》所收文体多样,精彩绝伦,是研究清末桐城派散文的重要文献。目前《抱润轩文集》已点校出版,其版本源流也得到细致的梳理^①,惜乎整理者未关注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稿本《抱润轩文》。该稿本应为《抱润轩文集》现存最早版本,还经过吴汝纶、萧穆、陈三立等名家手批,尤为珍贵。所有批校者均属桐城支脉,俨然形成一个互批互阅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出版学学术史文献整理、研究与资料库建设”(21&ZD321)子项目“本土自发形成的出版研究”阶段性成果。

① 严云绶等主编,孙维城点校:《桐城派名家文集·第8卷·马其昶集 戴钧衡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孙维城:《马其昶文集版本琐议》,《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79—81页。

“批校圈”,并最终影响到文集文本的凝定。校语从手批到刊刻的选录过程,也是文本由私人批阅走向公共出版的典型示范。

一、版本介绍

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稿本题名《抱润轩文》(索书号:4:4117),一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无栏线,天头留白较多,多存校阅者眉批。书前钤“琅琊大道王”白文方印一枚,萧穆读书章“敬孚鉴赏”朱文方印一枚,并存王尚辰题识两段:“癸卯^①十月下旬,合肥原学弟王尚辰拜读。”“通白文四册,此来读过半,惜因病未能卒业,而行又促也,故志此。庚子(1900)六月当世。”由此可知,此稿本曾经为合肥王尚辰阅藏,且彼时应为四册,惜今仅存一册。

题名为《抱润轩文集》且现存于世者,据《中国古籍总目》《清人别集总目》记载有以下三个版本:

抱润轩文集十卷 清宣统元年(1909)安徽官纸印刷厂石印本^②

抱润轩文集二十二卷 清光绪间刻本^③

抱润轩文集二十二卷 民国十二年(1923)北京刻本^④

据点校本《抱润轩文集》整理说明,整理者目验并鉴定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所藏光绪刻本实为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⑤,并以此本作为整理之底本。因此,《抱润轩文集》实存两种版本,即宣统元年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以下简称“宣统本”)与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以下简称“民国本”)。

稿本《抱润轩文》是《抱润轩文集》的早期版本。民国本《抱润轩文集》前有陈三立序一篇,作于1919年,交代了他阅读马氏文集的缘起:“马君通伯所为文,去今二十年间,余获而读之。前两岁续成近百篇,自京师寄余,且督为之序,余又获而读之。”^⑥由此推断陈三立在此前大约二

①该日期应为王尚辰记录错误,癸卯年如为1843年,此时马其昶尚未出生,如为1903年,则王尚辰(1826—1902)已去世。

②《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第5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02页。

③《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第5册,第2602页。

④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⑤严云绶等主编,孙维城点校:《桐城派名家文集·第8卷·马其昶集 戴钧衡集》,第4页。

⑥陈三立:《抱润轩文集序》,马其昶:《抱润轩文集》,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

十年间就陆续阅读过马氏的文章。据陈祖壬《桐城马先生年谱》：“二十五年己亥，先生四十五岁……与陈伯严定交。”^①可知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人始定交。次年二月九日，马其昶作《与陈伯严》书：“伯严先生足下：去冬匆促言别，未罄所怀，至今怅怅……拙文四册，别无副稿，前留尊案，乃是真心求益，想蒙鉴此微忱，严加笔削。”^②此次马氏请陈三立指正的文集一共有“四册”，与此稿本前王尚辰所说的“通白文四册”数量相同，且“别无副稿”，说明当时送与陈三立的文稿只存一份。如此说来，陈、马二人在己亥（1899）年定交之后，陈三立得到的四册稿本，很有可能就是今天所见的稿本《抱润轩文》。

马氏信中言“真心求益”，恳请陈三立对其文“严加笔削”，今《抱润轩文》稿本上留存有大量署名陈三立的批校，遍布诸篇，可见陈三立确实应邀批阅了文稿。陈三立的部分批校在后出的宣统本中被编辑者所引用，宣统本的目录后还载有陈三立小记：“曾张而后，吴先生之文至矣，然过求壮观，稍涉矜气，作者之不逮吴先生，而淡简天素，或反掩吴先生者，以此也。环堵私言，敢质诸天下后世。丙午六月义宁陈三立。”^③此段小记收入陈三立文集，并题为《抱润轩文集题辞》^④，丙午年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说明陈三立此时已经阅完《抱润轩文》并题辞。

综上所述，陈三立应在光绪二十六年得到此《抱润轩文》稿本，并最晚于光绪三十二年批阅完毕，其间王尚辰亦借阅并题识。由此可推测，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的稿本《抱润轩文》或为马其昶文集传世的最早版本，保存了《抱润轩文集》未刊定前的原始样貌。

二、内容差异问题

笔者将安徽省图所藏《抱润轩文》稿本与《抱润轩文集》的宣统本、民国本对校，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差异，包括篇目的增损、字词的修改和批校的变动等情况。借助稿本《抱润轩文》的目次框架，现将所校篇目差异整

①陈祖壬：《桐城马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4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②转引自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4年，第540页。

③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宣统元年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叶二。

④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28页。

理为简表 1,兹列于下:

表 1 《抱润轩文》篇目异文简表

篇名	稿本目次	点校本目次 ^①
《原学》	卷一甲戌	不存
《杂说二首》	卷一甲戌	《删稿》甲戌
《奉吴挚甫先生书》 ^②	卷一乙亥	不存
《上孙琴西先生书》	卷一乙亥	《删稿》乙亥
《李泌论》	卷一丙子	卷一丙子
《送阮仲勉序》	卷一丁丑	卷六丁丑
《雪夜课经图记》	卷一戊寅	卷二十一戊寅
《荀卿论》	卷一庚辰	卷一庚辰
《读法言》	卷一庚辰	卷二庚辰
《书程节妇事》	卷一辛巳	卷二十一辛巳
《风俗论》	卷一辛巳	卷一辛巳
《答族兄质甫书》	卷一癸未	卷九癸未
《赠刘摭图序》	卷一癸未	《删稿》癸未
《赠郑东父序》	卷一癸未	卷六癸未
《先太仆公逸事》	卷一癸未	卷二十一癸未;《删稿》 ^③
《先母行略》	卷一甲申(夹纸书写)	卷十一甲申
《为人后辨》	卷一甲申	卷一甲申
《为人后者其妻为本生父母服辨》	卷一甲申	卷一甲申
《庶子为其母党服辨》	卷一甲申	卷一甲申
《为长子服辨》	卷一甲申	卷一甲申
《葬期论》	卷一甲申	卷一甲申
《先孝子公血书梵经跋后》	卷一甲申	卷三甲申

①孙维城点校本目次以民国本为底本,《删稿》所收为民国本删去的宣统本文章。
②此篇与宣统本、民国本中的《上吴至父先生书》非为一篇,实为佚文。
③宣统本和民国本的《先太仆公逸事》都作于癸未,但是文字大不相同,故点校本将宣统本的此篇放入《删稿》中保存。

稿本《抱润轩文》应为四册中的第一册,共收入文章 22 篇,始于甲戌年(1874),终于甲申年(1884),以写作时间先后排序,文章涵盖论、辨、序、跋、书、启等多种文体。而后期的宣统本、民国本不仅未全收稿本中的文章,并且均按文体分类编排,“与姚先生《惜抱轩集》编次略同”^①。由此看来,稿本与后出本的编次大不相同,这更加反映出稿本的原始性。

(一)篇目之异

篇目增损情况较为复杂,稿本中的《原学》《奉吴挚甫先生书》两篇不见于宣统本和民国本之中,被彻底删去;《杂说二首》《上孙琴西先生书》《赠刘摭图序》存于宣统本,不见于民国本;其他文章均存于民国本之中。《抱润轩文集》的定本存在宣统本和民国本两个系统,通过稿本中甲戌(1874)、乙亥(1875)两年所存的《原学》《杂说二首》《奉吴挚甫先生书》《上孙琴西先生书》四篇文章可以简要反映两个定本的篇目选取过程。

稿本中《原学》篇后有不署名批校“此篇可不必存”^②一条,《杂说二首》篇后也有不署名批校“二首不必存”一条,对比马其昶《致少伯》^③的手迹,此两条批校很有可能为马氏手书,提醒文集整理时应删去文章。然《原学》篇被删去,《杂说二首》篇却仍被收入宣统本,因而笔者推断宣统本对文章的选录,可能并未完全遵从马其昶在稿本中的意见,这在宣统本卷前的整理说明中也能反映出一二:“右《抱润轩文集》,都为十卷……厘定体例,则嘉兴沈公、闽县李公^④;始稽校元文,复校字者,则合肥张介尊明经;襄校录之役者,则后学怀宁潘勛。宣统元年己酉嘉平月缮写将竣,并识于左。”^⑤可知规定全书体例的是嘉兴沈公与闽县李公,校录工作由合肥张介尊、怀宁潘勛参与,只字未提马氏,似乎此次文集整理并未得到马氏的首肯,查阅《桐城马先生年谱》也未见到相关信息。但是宣统本选用了稿本《抱润轩文》中的批校,说明整理者应该见过此稿本,却忽视了“此篇可不必存”等表明删去之意的批校。假设这些马其昶的批校是

①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宣统元年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叶一。

②马其昶:《原学》,《抱润轩文》,安徽省图书馆藏稿本。以下引自稿本的内容不逐一出注。

③王贵忱、王大文编:《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212页。

④沈公为沈曾植,官至安徽布政使。李公为李宗言,民国时期安徽官纸印刷局首任局长。二人曾合力主持刊刻多部安徽人文文集。

⑤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宣统元年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叶一。

在宣统本刊刻后添加的,那么宣统本擅自删去了《原学》《奉吴挚甫先生书》两篇文章,依旧是未遵原意。依据现有材料,无法查明马氏对宣统本的态度,似乎作者在文集刊刻时是缺位的。

民国本前有王树枏作于辛酉(1921)的序言:“君手勒其文,自丙子以迄今兹,凡得若干篇,而属予为之序。”^①由此可知,民国本是马其昶“手勒其文”,审定检查,可以反映马氏对自己文章的取舍。民国本所收文章的时间始于丙子(1876),而稿本始于甲戌(1874),相差的这两年中所作的《原学》《奉吴挚甫先生书》《杂说二首》《上孙琴西先生书》四篇文章很可能就是由马其昶亲自从稿本中删去的。并且《桐城马先生年谱》中附有马氏每年所作文章的篇目名称,在甲戌(1874)、乙亥(1875)两年亦无记载,可见上述四篇文章在马氏门人看来是无须存的,编谱者也有可能以民国本为参考来记录马氏的著述情况。

(二)内容之异

与稿本相比,后出本同见的每篇文章都有一定的差异,包括遣词造句、章法结构,有些文章几近于重写,如《先太仆公遗事》,稿本、宣统本与民国本的文本迥异。应当注意到这些修改绝不是简单的文字删减,也不仅仅是马氏一人之力所致。从甲戌年(1874)第一篇文章起,至民国十二年(1923)刻本《抱润轩文集》最终整理出版,马氏文章的创作与修改历时四十九年,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里,整个桐城派所处的政治与文化环境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孙维城认为桐城派发展到近现代时期,欧风美雨的影响已经使他们逐步接受了现代的西方气息,也就同时接受了现代西方的叙述方式与语言风格,此时桐城派散文的风气已经由雅洁走向了通俗^②。马氏自身的文学认识与价值观念也随桐城派不断更新,并体现在文章的修改之中。比较他的名篇《雪夜课经图》稿本与民国本的文字,可以发现稿本的语言冗杂繁复:

未几,鞠裳供职京师,居三年,汶汶无所试,一旦心悸,乞假省觐,克时日,独身走三千里以归,而先生则已前歿矣!余既别鞠裳,有姚仲实者,年少而才俊,交厚于余,与鞠裳同,姻戚亦同。余每对之,辄益思鞠裳。及闻鞠裳归,治丧浮山家祠,则往慰之,悼怀前事,相与流

^①王树枏:《抱润轩文序》,马其昶:《抱润轩文集》,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三。

^②孙维城:《桐城派后期文章的现代演变——以现代演化解剖马其昶〈抱润轩文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第217页。

涕。鞠裳痛父之不可复见,无以寄其悲思,乃命工画者追绘“雪夜课经图”,属余为之记。

民国本缩减颇多,以方鞠裳为叙事中心,删去旁生枝节,写作手法也更为简练,用短语替换长句:

未几,鞠裳以部郎供职京师,居三年,汶汶无所试。忽心悸,遽乞假省觐,未达而赴音至,遂奉丧归浮山家祠,痛父之不可复见,命工画者追绘“雪夜课经图”,属余为之记。^①

可见马其昶后期的修改使得文章愈发晓畅简洁、通俗易懂,这也印证了章太炎的评价:“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②

除开上述马氏的个人文学素养和外部文风等因素,稿本《抱润轩文》中的诸多批校也对文本的定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答族兄质甫书》表达了马其昶在得知族兄吴质甫不再受传闻困扰且“痛自惩艾”后的欣喜之情,稿本文字如下:

曩者传闻吾兄上海事,私心甚不快,因致书相规,书词切直,寄书者乃不肯以达,益以为恨。古豪杰之士,当落拓未遇时,不自检饬者多矣。乃往往一旦悔悟,卒能发奋自强,立勋名于世,然则前行固不足为兄累。后阅兄家书,果痛自惩艾,吾固知其有此。去年辱惠书,得益详悉近状,甚喜无量。

据此分析,前有去信,内容应是马其昶在听闻吴质甫的私事后,“心甚不快”,写下了“书词切直”的文字,用以规劝。陈三立似知晓相关事件或阅过前信,在此处批评道:“平心以度理势,持议自少肤蔽,然犹未许为阅历有得之言也,文气待充盈。”认为文气不充盈且行文肤浅是马其昶阅历不足导致的,很委婉地提醒他审时度势需要平心静气,不能过于显露个人情绪。马其昶吸收了陈三立的意见,故民国本已修改成:

曩者传闻吾兄上海事,私心甚不快,因致书相规,书词切直,寄书者乃不肯以达,益以为恨。古豪杰之士少不自检,一旦悔悟,卒立勋名于世者,往往有之,然则前行固不足为兄累也。^③

①马其昶:《雪夜课经图记》,《抱润轩文集》卷二一,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一。

②徐复点校:《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1页。

③马其昶:《答族兄质甫书》,《抱润轩文集》卷九,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一。

从附和宽慰的“不自检饬者多矣”到略带责备的“豪杰之士少不自检”的改动,并删去阅读家书后“甚喜无量”的激动言语,体现出的是马氏对待世事的态度的转变,不是年轻气盛的喜形于色,只会一味奉承与安慰,而是以平心来持议,激励“兄之才略终必为世用”^①。

稿本异文的价值还体现在不同版本批校的差异之中,如上述《答族兄质甫书》在民国本中就被删去了陈三立的所有批校。文学史作为一种实物史,与文本诸载本流传关系密切,批校可将诸版本串联,既是阅读痕迹,也是编辑线索。从稿本到刻本的批校变化所反映出的具体成书过程,使我们得以更接近真实的文学史,这是仅靠字词风格的文学分析所不能达到的。下文将从书籍史的角度入手,着力分析批校异文产生的现象及其原因。

三、从稿本到刻本:被隐匿的批校

从稿本到最终整理刊刻,批校的文本在不断变化,可参见下表 2。其中既有正向的创新补充,也有逆向的除旧改易,但其意义始终处于一种增殖状态,被不断地丰富。在此过程中,作者、批校者、编辑者、出版者等各种人物参与其中,正如《书史导论》中所引达恩顿“交流圈”^②揭示的那样,他们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精密的网络,在不同的时空之内使文本及信息得以流传。基于现有的文本材料,选取批校者和编辑者的角度来管窥蠡测,可见《抱润轩文集》成书之时,马其昶“批校圈”的运行情况,以及他面对批校文本的编辑策略和心态。

表 2 《抱润轩文》批校异文简表

篇名	稿本批校	宣统本批校	民国本批校
《原学》	意境平静类习之。(陈)	不存	不存
	拟删此句。(陈)	不存	不存
	转接纯在空处,是有得于古人。	不存	不存
	此篇可不必存。	不存	不存

①马其昶:《答族兄质甫书》,《抱润轩文集》卷九,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一。
②[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页。
③括号内为批校者姓名,其中陈为陈三立,吴为吴汝纶,萧为萧穆,孙为孙葆田。

续表

篇名	稿本批校	宣统本批校	民国本批校
《杂说二首》	绵邈有神致。(陈) ^③	无变化	不存
	转接不测。	署名“吴至父先生”	不存
	二首不必存。	不存	不存
《奉吴挚甫先生书》	此处幸不负期待,学业则深愧此篇。(吴)	不存	不存
《上孙琴西先生书》	委复尽意。(陈)	无变化	不存
	此文原出《战国》,有志为孔子之徒者当远悔之。	署名“郑东父”,并多张廉卿批校一条	不存
《李泌论》	精允立论。(陈)	不存	不存
	深明事体,文气与苏氏为近。(孙)	无变化	无变化
	按切时事,有长公之恣肆,而不邻于轻剽。	署名“吴至甫”	署名“吴至甫”
《送阮仲勉序》	学韩嫌未脱窠臼。(陈)	不存	不存
	此文词理简备,实不以肖韩为嫌,立覆读又记。(陈)	少“覆读又记”	少“覆读又记”
	起突兀有奇气,著语亦精练,不肯一字犹人,是学昌黎有得者。	署名“吴先生”	署名“吴先生”
《雪夜课经图记》	此文乃近归熙甫,真挚处尤为恻恻动人,具教良友规劝之义。(孙)	不存	不存,有柯凤生批校一条
《荀卿论》	古人之持说立教不一,其端要皆为发愤救时而设,文能观其大通,气息亦厚。(陈)	无变化	无变化
	论正而文亦入古。(萧)	不存,有张廉卿批校一条	不存,有张廉卿批校一条

续表

篇名	稿本批校	宣统本批校	民国本批校
《读法言》	识议独出,所谓拟之而后言者与。(陈)	无变化	无变化
	高简毕括其所见。(陈)	不存	不存
《书程节妇事》	动容语,神似古人。(陈)	不存	无变化
	姑入室及妇遽两段最精采。	不存	不存
	此段叙述尚疑未甚高遒。(陈)	不存	不存
	此文可上之国史馆,入《列女传》。(萧)	不存	不存
《风俗论》	气体博厚。(陈)	无变化	不存
	气醇理充而笔法变化。	署名“方柏堂”,并多孙佩南批校一条	署名“方柏堂”,并多孙佩南批校一条
《答族兄质甫书》	平心以度理势,持议自少肤蔽,然犹未许为阅历有得之言也,文气待充盈。(陈)	不存	不存
	欧洲立国之大本大原,实具有中国三代以前规模,绝非一于逐末所能至此。此尚以道器义利相比况,似未及博观深究,仍狃于儒生故常之见。(陈)	不存	不存
《赠刘摭图序》	条晰似朱子说理之文。(陈)	无变化	不存
《赠郑东父序》	名通冲婉,擅惜抱之胜。(陈)	无变化	无变化
	夫自秦汉以下,拜嘉颺参。	不存	不存
《先太仆公逸事》	无	无	有姚叔节批校一条
《先母行略》	沈挚。(陈)	不存	无变化

续表

篇名	稿本批校	宣统本批校	民国本批校
《为人后辨》	犁然当于人心之文。(陈)	无变化	无变化
	折中至当,通变称情,可谓深知礼意。	署名“吴先生”,并多姚叔节批校一条	署名“吴先生”
《为人后者其妻为本生父母服辨》	船山王氏专斥妇为舅姑服三年之失而不甚察,所以励薄俗者,此乃党无漏义。(陈)	不存	不存
	探追情变确义,以成其通论。(陈)	无变化	无变化
	义精辞足,似《望溪集》中文字。	署名“吴先生”	署名“吴先生”
《庶子为其母党服辨》	达识雅辞,与前二篇相称。(陈)	无变化	无变化
	议礼诸篇,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署名“吴先生”	署名“吴先生”
《为长子服辨》	极控纵恢疏之致,立说忠允,更无待言。(陈)	无变化	无变化
	论难既能分风擘流,断制亦极精审。	无变化	无变化
	此文可续载《皇朝经世文编》。(萧)	不存	不存
《葬期论》	本人心所安,以推礼意,而尽其变,故不徇高论,不牵俗情如此。(陈)	无变化	无变化
	陈义绝精,此所谓先王未之有而可以义起者也。	署名“吴先生”	署名“吴先生”
	葬地难得,常欲早求之,亲年不待,然后用斯议可也。	署名“郑东父”	不存
	自《为人后辨》至此五篇,持论皆当,均可载续《皇朝经世文编》。(萧)	不存	不存

续表

篇名	稿本批校	宣统本批校	民国本批校
《先孝子公血书梵经跋后》	低仰凄惋之音，泠泠欲绝。 (陈)	无变化	无变化
	沈至，文与情称。	署名“吴先生”	署名“吴先生”

(一) 马其昶的批校圈

批校诞生于阅读时的第一现场，因而批校者更加接近于阅读史研究的理想对象，即“历史上真实的读者”^①，他们留下了或褒或贬的评价，既代表着对文本的接受程度，又反映了阅读的过程。批校后的署名，方便我们去确认这些“真实读者”的身份信息，而结合日记、文集、年谱等其他资料，可以来探寻批校者与作者、批校者与批校者之间的蛛丝马迹。《抱润轩文》作为文集的稿本，共存有文学评论性的批校 49 条，除了《先太仆公逸事》之外，每篇都写有批校，少则一条，多则三四条。其中清楚注明作者的有陈三立、吴汝纶、萧穆和孙葆田四人，还有部分批校在后出版本中添加了署名，有郑杲、方宗诚，可见当时马其昶延请了多位古文名家鉴赏自己的文集。马氏作为桐城派的殿军，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领军人物，这些批校者多出自于桐城派及其支脉，与马其昶或为亲友，或为师徒，围绕着他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批校圈”^②。

陈三立与范当世为儿女亲家，范当世与马其昶为连襟，陈与马二人有姻亲关系。二人虽相识较迟，但是交往亲密，时常切磋学问，陈三立不仅给予《抱润轩文集》“精深微妙，卓卓树立”^③的高度评价，还在母亲黄氏去世之时，邀请马其昶撰写墓志铭^④，都体现他对马氏古文的认可和推

①即“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人，真的接触过书籍，读过其中的文本，并且生成了自己对文本的阐释”（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 年，第 15—16 页）。

②关于桐城派内部较为封闭的批点圈与阅读圈问题，已有学者关注，详参徐雁平：《批点本的内部流通与桐城派的发展》，《文学遗产》2012 年第 1 期，第 100—112 页；徐雁平：《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桐城模式——基于萧穆咸同时期日记的研究》，《文学评论》2020 年第 3 期，第 141—150 页；尧育飞：《秘本与桐城派古文秘传》，《文学遗产》2021 年第 6 期，第 117—129 页。

③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中册，第 949 页。

④即马其昶《陈母黄夫人墓志铭》，《抱润轩文集》卷十七，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九。

崇。马其昶病逝之后,陈三立的哀痛之情溢于言表,“倒肠别语飘江水,余卧匡山梦故人”^①。“南陈北马夙齐誉”^②,二人的成就与情谊素为世人所称道。

萧穆与马其昶之父交好,对他以叔侄相视,时常督其课业学习。马其昶在早年时也汲汲于功名,但数次赴考却无所获,萧穆劝他“当坚忍家居读书,不当外出,而重以乡邦五六百年文献之传”^③。受此启发,马其昶开始整理桐城文献。在编写《桐城耆旧传》的过程之中,萧穆也助力颇多,无私献出自己所作的《桐城文征》《桐城耆旧传状碑志汇钞》等成果,为此马其昶称赞道:“承留意搜讨掌故数十年,今将举以相属,谓但使书传,不必自我出,大哉言乎!”^④马氏深深感激于萧穆的关心与指导,感叹“非至笃爱,孰肯言此者”^⑤。

吴汝纶的学术地位与古文水平在桐城派内自不必多言,他的指导为马其昶日后的古文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其昶始学文时,受知爱莫夙于先生,开辟径途,不迷其源,不阻其修,其得力惟先生多”^⑥。据《桐城马先生年谱》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吴汝纶回桐城奔父丧,马其昶始师于吴汝纶^⑦。后师徒二人虽“南北分异”,亦常常用书信交流学习。《上吴至父先生书》记载马其昶谨献“文二册,又读《易》笔记一册”^⑧,请吴汝纶赐教,是以有了今天文集中保存的一部分吴汝纶批校。

萧、吴二位长辈是马其昶最亲密的师长,对他的为人为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马其昶在《吴挚父萧敬甫二先生传》中深情追忆道:“今吾书成,而皆已不见,悲夫!茫茫终古,次二先生事,泫然久之。”^⑨

郑东父、孙葆田与马其昶相识于京师,是学术挚友,对他的治学路径有很大影响。郑东父即郑杲,彼时任刑部主事,马其昶与他交往甚密,

①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中册,第700页。

②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第1388页。

③马其昶:《答萧敬甫丈书》,《抱润轩文集》卷九,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九。

④马其昶:《答萧敬甫丈书》,《抱润轩文集》卷九,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十。

⑤马其昶:《答萧敬甫丈书》,《抱润轩文集》卷九,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九。

⑥马其昶:《上吴至父先生书》,《抱润轩文集》卷九,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十。

⑦陈祖壬:《桐城马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4册,第18页。

⑧马其昶:《上吴至父先生书》,《抱润轩文集》卷九,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十一。

⑨马其昶:《吴挚父萧敬甫二先生传》,马其昶撰,彭君华校点:《桐城耆旧传》,黄山书社,2013年,第397页。

“先是予在京寓所,与东父故庐相望,每治经,获一义,畜一疑,欲是正于人,皆卒卒少暇”^①，“月与君(郑杲)必再三见,每见开口言论,皆三代典籍”^②。马其昶虚心求学,在郑杲“《易》视他经易明,以有《十翼》可据依也”^③的启发下,确定了自己以《易》治经的路径,最终写就名著《周易费氏学》。可以说,在京期间,马其昶的进步多得益于郑杲的指导。郑氏遗作也由马其昶搜集而编纂成《郑东父遗书》,其中可见二人有着十分频繁的书信交往。孙葆田与马其昶同师于张裕钊门下,十分敬佩马其昶的人品学问:“及光绪辛巳始,遇之于京师,读其文,接其人,窥其中之所蕴,盖庶几所谓有若无,实若虚者,则信乎。其学之为己,而非他人之务外者可比也。”^④京师一别后,孙葆田调任合肥时,二人再会,相谈甚欢,“相与寻绎旧闻,往往穷日夜不懈”^⑤。根据《赠马通伯序》一文,可以发现孙葆田在这次相聚时确实阅读并评价了马氏文集,尤其赞赏其中“丧服”诸篇:“有论丧服数篇,皆卓然有见于古昔圣人制礼之本意,圣人复起,必将有取于是。”^⑥

通过考察诸位批校者与马其昶的交游,可以发现在以马其昶为中心,基于姻亲、情谊、流派而展开的“批校圈”内,批校成为连接各家的纽带之一,引发了频繁的学术联系,这使得《抱润轩文》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流传起来。圈内之人所见的文本有着较为原始的样貌,是一个相对的“封闭式文本”,只对作者与批校者等指定人群开放,只存在于马其昶的“批校圈”这个特定范围中,此阅读过程是圈外人难以参与其中的,其私密性不言而喻。此外,关于“批校圈”还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马氏“批校圈”里的学术交流绝对不是单向单核的,而是各为中心,通过彼此批校来互相成全,如陈三立《雪夜诵叔澥与吴挚父京卿唱酬之作次韵有寄》言“吴先曾定吾文者,纵浪人间有此雄”^⑦,表明吴汝纶还为陈三立点定过文章。吴汝纶的文章也经由马其昶修改:“七月二日,与范肯堂云:病中

①马其昶:《读毛氏学序》,《抱润轩文集》卷四,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十九。

②马其昶:《郑东父传》,《抱润轩文集》卷十一,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七。

③马其昶:《郑东父传》,《抱润轩文集》卷十一,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九。

④孙葆田:《校经室文集》卷三,《丛书集成续编》第19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349页。

⑤孙葆田:《校经室文集》卷三,《丛书集成续编》第198册,第350页。

⑥孙葆田:《校经室文集》卷三,《丛书集成续编》第198册,第350页。

⑦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上册,第56页。

成《淮军昭忠祠记》一首,自知漫率不成文,通伯(马其昶)颇有议删之处,兹录稿呈政,务望痛加改削。”^①其二,“批校圈”绝对不是此稿本《抱润轩文》所反映出的特殊现象,仅就实物留存来看,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姚永朴《蜕私轩文稿》(索书号:4:4116)的稿本之上,就有方宗诚与马其昶的批校数十条,如马其昶评价《西山精舍图记》曰:“《归太仆集》中时有真朴之作,穷为高境,此种是其嗣音。其昶记。”方宗诚评价《先妣事略》曰:“为人子者,固当以立身行道为题,扬之极高也,勉之。宗诚记。”马其昶与姚永朴都曾师从方宗诚,姚永朴又为马其昶妻弟,这也是一个依靠姻亲与师友关系联结而成的批校圈。

(二)被隐匿的批校

任何一个版本的文本,都是为特定的读者市场准备的,与马其昶私人“批校圈”无关联的公共读者,只能阅读到经过修改审定而公开出版的《抱润轩文集》。编辑作为出版活动的第一个环节,通过字词的改动与篇章的取舍,与作者一起构建文本形态。但是在非商业出版中,尤其是个人文集这类主观性极强的文本,编辑的职责往往由作者来承担,编辑行为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作者意志。如前文所述,宣统本体现的作者意图并不十分明显,而民国本《抱润轩文集》是马其昶“手勒其文”而“得若干篇”,确定了文集中可供开放阅读的部分。因此将稿本与民国本加以比较,就可以还原《抱润轩文》从私人批阅读本到公共出版书籍的编辑过程,其中马其昶删去或修改的内容,即是作者欲对公共读者隐匿的部分。隐匿了什么?如何隐匿?为何要隐匿?下文以批校为例,逐一说明上述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隐匿了什么?据上文表2统计,可以大致归纳出如下几种类型:第一,与《原学》《杂说二首》等文章一同删去,共计9条,批校与原文本均丢失。第二,萧穆的所有批校,共计3条,以夸赞为主。查阅民国本全集,也无其他萧穆批校,马其昶似乎想要给读者以萧穆从未批阅此文集的认识。第三,陈三立、孙葆田等人的部分批校,内容为贬者或一些空话、套话。

至于如何隐匿,通过对批校文字的比对,可以发现隐匿方法以“删”“改”“增”三种为主。首先,整句删除的大多是持批评态度或提出异议的批校,这样的嫌隙纷争当然是不愿被广大读者看见的。清末内外交困之际,“洋务运动”带来了中学与西学的思潮交锋。马其昶在《答族兄质甫

^①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二“二十年甲午”,民国三十三年雍睦堂丛书本,叶七。

书》中痛斥西学,“故其相与讲求者,器耳,无所谓道也。其相与计画者,利耳,无所谓义也。此亦至猥贱不足道矣”。西学所代表的舍本逐末、重利轻义观念,与中国几千年来君臣父子、礼义廉耻的治国之基本末倒置,损害极大。那些提倡西学者“虽曰诵习圣人之言,而皆怀利禄之见”,“故凡天文、测海、算法、舆图、制船、造物,有可以益商务而助兵力者,无不日新月异,竭尽全力以图之”的目的在于得利,“以浮夸嗜利之徒而期以救时达变”是种大耻。马其昶在文中对于西学几乎全面的否定,陈三立不尽赞同,批评道:“欧洲立国之大本大原,实具有中国三代以前规模,决非一于逐末所能至此。此尚以道器义利相比况,似未及博观深究,仍徇于儒生故常之见。”陈三立认为只批判西学自强和求富的末,未见其与中国相似的政治人文之本原,是拘泥在旧学中的儒生见解,不够深入全面。马氏不赞同陈三立的观点,未按照陈氏意见修改文字,自然也不会留存此批校。

其次是“改”,直接改写关键信息,民国本的《送阮仲勉序》中留有陈三立批“词理简备,不以肖韩为嫌”^①,但是稿本上此句实为“此文词理简备,实不以肖韩为嫌,立覆读又记”,那么覆读之前,陈三立的看法如何?稿本中位于其旁的另一条陈三立批校曰“学韩嫌未脱窠臼”。两句话旨义相同,均说马氏的文法文风学自韩愈,但“未脱窠臼”似是表达出对其循规蹈矩、落入俗套的批评,而“不以肖韩为嫌”的语气极尽委婉,一褒一贬,如何去取,一目了然。改掉“立覆读又记”,或是为了让读者相信陈三立的评价一贯如此,隐去了他态度转变的过程,塑造出此文完美的形象。

最后是“增”,增加稿本上所不见的批校。马其昶的学苏名篇《荀卿论》在民国本上,有张廉卿(裕钊)的批语:“识议非俗儒肠胃中所有,文亦屈盘瘦劲。”^②此条批校不见于稿本,张裕钊于1894年去世,无论是宣统本还是民国本的刊行都要晚于此时间。与此相类似的是《上孙琴西先生书》一篇在宣统本中也多了不见于稿本的张裕钊批校一条“盘折瘦劲,最近似介甫”^③,但通过民国本卷前张裕钊丙子年(1876)所作的题辞判断,他看过此文且做过相似评价:“读足下《上孙方伯(琴西)书》往复再

①马其昶:《送阮仲勉序》,《抱润轩文集》卷六,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一。

②马其昶:《荀卿论》,《抱润轩文集》卷一,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三。

③马其昶:《上孙琴西先生书》,《抱润轩文集》卷四,宣统元年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叶一。

四……足下学介甫文,已甚肖似,此后便可上窥昌黎、介甫之瘦硬精谨。”^①又《抱润轩文集》中《书张廉卿先生手札后》一文载“今复汇前后手札十余通装池之”^②,可见二人书信往来之频繁,因而未见于稿本的张氏批校很有可能节选改写自二人的书信。张裕钊为一代诗文名家且桃李满天下,辑录张氏对文章的评价,一方面是马其昶出于对先师先贤的尊重怀念,另一方面也是在积极证明文集自身的质量。

通过上述对马氏编辑策略的分析可以发现,批校作为一种私密阅读的痕迹,附着于正文,在编辑过程中,可以出于个人的选择,被轻易删改而不留痕迹,让人无从察觉。但是批校的隐匿会带来连锁反应,如若作者受批校的影响而修改文意,最后却将它隐匿,则是在客观上侵占了他人的创意或掩盖了自己的失误,那么批校者丢失的不仅仅是“署名”的机会,更是被迫割让了自己在意义构成中的一席之地。一系列的暗流涌动,大众读者在经过精细修改的公开发行文本中是阅读不到的,他们被编者筛选过的批校、标题等引导着阅读,所见皆是被预先设计的内容。

至于为什么要隐匿部分批校,动机一或是遵循“趋利避害”的编辑思想,这是个人好恶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将名家批校示予后人,以达到提升文集知名度或帮助读者阅读的目的,在从稿本到刻本的修订过程中,整理者往往留下夸赞之语,删去批评之语,如上表中陈三立的批评均被删去。这是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理,虽有悖于求实的治学态度,但实为人之常情。除此之外,《抱润轩文集》作为公共出版物,由上文所述来看,是在经过名家批校修改和作者精心审定之后才付梓印刷的,不仅代表马其昶的个人文学水平,更是桐城派内部关系及其“批校圈”面向大众展示的窗口,因此马氏对批校的取舍可能也会为外部环境所迫,顾及读者感受与社会影响。民国刻本问世的1923年,桐城派已经从“清代第一大文派”的神圣地位上跌落,随着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文学改革先驱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将矛头直指桐城派:“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③钱玄同极赞许陈氏之论,称:“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

①张裕钊:《抱润轩文集题辞》,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四。

②马其昶:《书张廉卿先生手札后》,《抱润轩文集》卷三,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十。

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论文(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0页。

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①伴随着“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的骂声,桐城派为旧文学殉葬和为新文学献祭的命运,已变得无可逃避。又恰逢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吴汝纶、姚永概以及为桐城派积极辩护的林纾、严复等人纷纷去世,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此时已不复存在^②。马其昶作为桐城派最后的掌旗者,对当下喜新恶旧的风气转变十分敏感,“近时士风喜言新学,于老成人殆忽视焉。夫士负奇自喜,不与众同酸咸,则群起怪之,此其习尚诚非厚。虽然彼其怪之,犹知其可贵也,今相率贱简之耳”^③。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抱润轩文集》成了桐城派稀有的硕果,将桐城诸家批校过录,参考其中积极的评价,删去负面评价,而后汇集众家之言并通过马氏展出,形成一派祥和的景象,或许是为了维护“天下文章,其出桐城”的最后尊严。

二是马其昶对桐城派固有批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显然指导了他对批校文本的编辑工作。批点与文本相依存,在字里行间和天头地脚等留白处,用文字形式的批校和符号形式的圈点指导读者的阅读行为,影响读者的知识习得,又在代代传承中形成一定范式,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桐城派很好地保留了批点之学,并将其发展为学派特色,如唐文治云:“圈点之学,始于谢叠山,盛于归震川、钟伯敬、孙月峰,而大昌于方望溪、曾文正。”^④其中归震川(有光)、方望溪(苞)、曾文正(国藩)均与桐城派有着深厚渊源,可见桐城派在中国古代文学批点中的重要地位。桐城派的批点之学始于对明末归有光《史记》圈点本的过录与传习,而后道光年间王拯撰《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张裕钊又在此基础上刊刻《王世贞、归震川、方望溪、吴挚甫评点本史记》,纵观对《史记》的批点,即历经了归有光、方苞、王拯到张裕钊等名家的累积和传承。发展至光绪与宣统二朝,桐城批点已蔚为大观,尤以马其昶的《韩昌黎文集校注》为代表,“融会群

①钱玄同致陈独秀信,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91页。

②关爱和:《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中的新旧之争——以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冲突与交锋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73页。

③马其昶:《谦斋诗集序》,《抱润轩文集》卷三,民国十二年北京刻本,叶十二。

④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自叙》,王桐荪等选注:《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

言,自具炉冶”^①,博采方苞、姚鼐、刘大櫟等桐城巨擘以及李光地、何焯、王鸣盛等经史名家的批校千余条,可以说是合清一代文人之力构建了韩愈文章的阐释体系。在补注《韩昌黎文集》时,马氏“订正旧注之失,增删点窜其文字”^②,强调以“刊落浮词,存其粹语”^③的态度来甄录批校。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姚永概曾与马其昶讨论过方苞对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的评点:“与通伯谈望溪深非韩公《潮州刺史谢上表》、柳公谪时与诸故人书,皆嫌其气不能振。通伯言柳公之文实佳,而气则实卑,但语语是悔过,并不自文,是他好处。”^④徐雁平分析此次讨论可能影响到马氏在《谢上表》一篇中选何焯、储欣、刘大櫟、曾国藩、张裕钊诸家之语,却未录方苞之语^⑤。可见马其昶对批校并不是唯名家而尽取,而是经过思量与比较,遵守一定的原则。这种批校传统与选录态度一直延续到《抱润轩文集》中,稿本中部分高度赞扬性的名家批校被删去,亦可见马其昶有自己的考量。

马氏对批校的选录与修改策略,因事而变,因人而变,是他干预文本时留下的明显痕迹。从已有的线索中,可以窥见马其昶在面对诸家批评时的复杂心态与处理方式,以及桐城派内部掩饰分歧、塑造群体形象的努力。

四、结语

安徽省图书馆藏稿本《抱润轩文》作为马其昶文集现存的最早版本,颇具价值。而其中的批校,在白纸黑字之外,恰似一条丝线,巧妙地穿梭于稿本与定本之间,勾连起从清末到民初的不同时空中,陈三立、吴汝纶等众多人物对马氏文字的共同审视,构成今日可见马其昶文集的完整样貌。而那些被隐匿的批校,为读者在正面所不见,是藏在绣布背后的密密针脚,往往杂乱和扎手,却能显示出每一勾一挑的手法,用以传达作者意图。韦胤宗以“浩荡游丝”来比喻条条批校汇总后所形成的“风”与

①②③马茂元:《叙例》,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页。

④姚永概著,沈寂等标点:《慎宜轩日记》,黄山书社,2010年,第240页。

⑤徐雁平:《批点本的内部流通与桐城派的发展》,《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第107页。

“势”^①,桐城派拥有优良的批校传统与丰富的批校文本,对其进行细致的梳理,也必能“观风查势”,感应到桐城批校在清代文学中的历史涌流。以此为启发,面对清中期以前中国书籍史研究文献稀缺的难题,不如穿透精致文本的表层,触摸这些历史行走过的真实痕迹,解开批校的千千结。

此外,稿本中的批校是“深度阅读”的记录,直观地展现了批校者的文学观念,可为陈三立、吴汝纶等人的古文研究打开新的道路。如陈三立的古文转益多师,形成了奇伟幽峻的文气与雅洁清丽的文法,然“海内争诵其诗,至真知其文者不多”^②,而在巨作《散原精舍诗文集》之外,《抱润轩文》稿本中陈三立的批校正是可供研究的材料,其中“精允立论”“犁然当于人心之文”“词理简备,不以肖韩为嫌”等都可以体现出他对韩愈文从字顺、文以明道等文学观念的遵从,不负李渔叔“至其文章,尤为奇伟,铭幽之文,韵语直承昌黎法乳”^③的夸赞。

本文承蒙山东大学何朝晖、李开军、张知强以及匿名审稿专家的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陈锴,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书籍史、地方文献、版本目录学。

①韦胤宗:《浩荡游丝:何焯与清代的批校文化》,中华书局,2021年,第2—3页。

②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第1435页。

③转引自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下册,第1562页。